

克里奥尔女人不再疯狂:《藻海无边》中 安托瓦内特性别化种族身份的重构

陈李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应用英语学院欧美文化研究中心, 北京 100024)

[摘要] 经典重写是当代英语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的重要现象。文章聚焦《藻海无边》中安托瓦内特的性别化种族身份,解读作者吉恩·里斯如何在这部《简·爱》前传中通过多声部叙事结构重构安托瓦内特的性别化种族身份。文章通过解析安托瓦内特经历的认同障碍及其与其他作品人物,如简·爱及罗切斯特的身份比较,还原这个原本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克里奥尔白人姑娘演变为疯女人伯莎的过程,揭示安托瓦内特的身份实质及其身份重构的意义。

[关键词] 《藻海无边》;安托瓦内特;身份重构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4)05-0110-06

经典重写^①是当代英语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的重要现象。重写作为一种书写策略和话语实践,体现了后人对前人或接受、或认同、或戏仿的态度,显出于文本对母文本的引用、改写、戏仿、改编、误读、翻译、评论等,几乎涵盖文学活动中的生产、传播、接受、消费和再生产过程。此外,经典重写还承载着审美、文化、心理、政治等多重转化功能。它开创了一个独特的文学、文化与跨文化接触空间,在这个多元互动的空间内,各种跨文类、跨文化与跨媒介重写、批评接受与读者接受不断重塑着文学的边界,改变着以同质文化为界面、线型历史为纬度的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模式,并持续挑战着传统的以摹仿和再现为认识论基础的文学认知模式。因此,经典重写引发文学边界的重塑、文学认知模式的变革、经典建制的改革以及文学史的重写。

纵观当代英语文学界,各种以英国小说为源点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重写层出不穷。吉恩·里斯(Jean Rhys, 1890—1979)在《藻海无边》^②(Wide Sargasso Sea, 1966)中将自己对西印度群岛的充分了解,对种族身份的深刻洞见,重现在

这部《简·爱》前传中,该书已成为后殖民文学研究的重要文本。约翰·库切(John Coetzee, 1940—)的《福》(Foe, 1986)不仅是对《鲁宾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 1719)的后殖民重写,同时也是对英国殖民史乃至整个西方文明史的重新阐释。伴随着女权运动第二波纷至沓来的众多女性主义经典修正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女权政治期许,它们着力打破根源于“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并试图探索新的文学再现方式与叙事策略。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 1949—)的《水之乡》(Waterland, 1983)是众多《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 1860—1861)重写本^③中的新历史主义重写,它抛开了宏大叙事的历史,解构传统的历史观。

一、《藻海无边》批评综述

《藻海无边》以《简·爱》前传的姿态革命性地重写了《简·爱》母文本,引发评论界经久不衰的热评。早期的评论关注《藻海无边》对《简·爱》中的人物,尤其是罗切斯特的重塑。沃尔特·艾伦

[收稿日期] 2014-07-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世界文学史新建构’的中国化阐释”(项目编号 12AZD090);教育部一般项目“世界文学重构与中国话语创建”(项目编号 12YJA751011)

[作者简介] 陈李萍(1976—),女,陕西咸阳人,副教授,博士,欧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英国剑桥大学英语系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英语小说、性别研究、西方批评理论。

(Walter Allen)发表在1967年6月18日《纽约时报书评》上的评论指出,《藻海无边》中的“罗切斯特几乎和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伯莎·梅森一样阴暗。”内维尔·布雷布鲁克(Neville Braybrooke)则对《藻海无边》赞赏有加。在1970年的《加勒比季刊》(Caribbean Quarterly)上,布雷布鲁克深入探讨了吉恩·里斯笔下的女性人物与加勒比社会白种克里奥尔女性之间的关系。^{[1]43-46}与此同时,也有评论认为里斯笔下的女主人公过于千篇一律。^④ V. S. 奈保尔(V. S. Naipaul)在为1972年版《离开麦肯齐先生以后》(After Leaving Mr. Mackenzie)撰写书评时肯定了吉恩·里斯创作的超前性。奈保尔的支持对于同为加勒比离散作家的吉恩·里斯显得格外重要。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藻海无边》的评论逐渐汇成3股主流,即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和克里奥尔身份批评。1976年,朱迪斯·瑟曼(Judith Thurman)发表在女权杂志MS上的文章从

女性主义视角探讨了《早安,子夜》与《藻海无边》这两部作品。20世纪80年代以来,《藻海无边》的女性主义批评论著争相涌现。伊丽莎白·贝尔(Elizabeth Baer)的论文《简·爱与安托瓦内特·科斯韦之间的姐妹情谊》(“The Sisterhood of Jane Eyre and Antoinette Cosway”,1983)颇具新意地从女性主义的关键概念——“姐妹情谊”着手,分析简·爱与安托瓦内特·科斯韦之间的关系。在同一篇论文中,贝尔还详细解读了安托瓦内特3个梦的寓意。^{[2]131-48}南希·哈里森(Nancy Harrison)在《吉恩·里斯与作为女性文本的小说》(Jean Rhys and the Novel as Women's Text,1988)一书中分析了女性文本与女性读者群之间的关系。^⑤

自上世纪70年代末后殖民开始在吉恩·里斯的作品中留下注脚,《藻海无边》一直是后殖民批评关注的热点文本之一。海伦·蒂芬(Helen Tiffin)认为吉恩·里斯的女性/男性、西印度/英国二元对立反映了主/奴与殖民者/被殖民者的关系。^{[3]328-41}

① 本文作者认为,经典重写主要涉及原作之后的跨文化、跨文类、跨媒介文本对原作进行的改写(revision)、续写(prequel and sequel)、戏仿(parody or burlesque)、改编(adaption)及评论等。“改写”(又译“修正”),对应英文的“revision”,多指针对原著中隐含的意识形态进行重新书写。该词常与“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词一起使用,构成“女性主义经典修正”(feminist revision)、“后现代经典修正”(postmodern revision)以及“后殖民经典修正”(postcolonial revision)。“续写”通常指在原著基础上写就的前传或后传。“戏仿”即“通过诗歌或小说模仿某一严肃文学作品的方式(形式和风格)或题材,或某一文学类型,但由于方法上和题材之间滑稽性的不协调,致使这种模仿变得滑稽可笑。”参见M. H. 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中英对照),吴松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改编”多指电影、电视、广播、舞台等跨媒介重写行为。

② 又译《藻海茫茫》、《苍海茫茫》,但较为普遍的译法为《藻海无边》。

③ 近20年来,重要的《远大前程》重写小说有:凯西·阿克(Kathy Acker)的《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1994),彼得·艾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的《英国音乐》(English Music,1994),约翰·欧文(John Irving)的《苹果酒屋的法则》(The Cider House Rules,1999),彼得·凯里(Peter Carey)的《杰克·马格斯》(Jack Maggs,1999)等。

④ 例如,梅隆等人的评论,参见Elgin W. Mellow, “Character and Themes in the Novels of Jean Rhy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3 (1972), pp. 458-75。

⑤ Nancy Harrison, Jean Rhys and the Novel as Women's Text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 pp. 196-208. 此外,还有一些评论家探讨吉恩·里斯作品中的母亲形象以及里斯与其母的关系,如朱迪斯·K.·加德纳的《里斯、斯特德、莱辛与共鸣政治》(Rhys, Stead, Lessing and the Politics of Empathy, 1989)和德波拉·K.·克洛普弗(Deborah K. Kloepfer)的《难以言说的母亲》(The Unspeakable Mother: Forbidden Discourse in Jean Rhys and H. D., 1989)。莫莉·海特(Molly Hite)的《故事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the Story: Structures and Strategies of Contemporary Feminist Narratives, 1989)则探讨了里斯作品从70年代的形式主义到80年代女性主义的批评转向。李·欧文(Lee Erwin)的论文“‘如在镜中’:《藻海无边》中的历史和叙述”(“‘Like in a Looking Glass’: History and Narrative in Wide Sargasso Sea”, 1989)、莫纳·费亚德(Mona Fayad)的论文“躁动的幽灵:吉恩·里斯《藻海无边》中的再现之争”(“Unquiet Ghosts: The Struggle for Representation in Jean Rhys's Wide Sargasso Sea”, 1988)和卡洛琳·罗迪(Caroline Rody)的论文“焚烧宅邸:《藻海无边》之重写范式”(“Burning Down the House: The Revisionary Paradigm of Jean Rhys's Wide Sargasso Sea”, 1993)从女性主义视角切入《藻海无边》,关注小说叙事结构与女性主体身份之间的关系。参见Judith K. Gardiner, Rhys, Stead, Lessing and the Politics of Empath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Deborah K. Kloepfer, The Unspeakable Mother: Forbidden Discourse in Jean Rhys and H. D. (Ithaca: Cornell UP, 1989); Molly Hite,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ory: Structures and Strategies of Contemporary Feminist Narratives (Ithaca: Cornell UP, 1989); Lee Erwin, “‘Like in a Looking Glass’: History and Narrative in Wide Sargasso Sea,” Novel: A Forum on Fiction, 22. 2 (Winter, 1989), pp. 143-58; Mona Fayad, “Unquiet Ghosts: The Struggle for Representation in Jean Rhys's Wide Sargasso Sea”, Modern Fiction Studies, 34. 3 (Autumn, 1988), pp. 437-52; Caroline Rody, “Burning Down the House: The Revisionary Paradigm of Jean Rhys's Wide Sargasso Sea,” Famous Last Words: Changes in Gender and Narrative Closure, ed. Alison Booth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1993), pp. 300-25.

当代后殖民批评理论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的论文《三个女性文本和一个帝国主义批判》(“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1985)无疑是《藻海无边》后殖民批评中极为重要的一篇力作。该文从简在家庭中所处的边缘地位着手,解读这部英国经典小说中作者夏洛蒂·勃朗特与帝国主义的共谋。斯皮瓦克将《简·爱》中克里奥尔疯女人伯莎的悲惨命运解读为“帝国主义的认知暴力”^{[4]250}。她认为,“在这个想象中的英国,她(伯莎)必须扮演自己的角色,将她的‘自我’转变成想象的‘他者’,放火烧毁房子,也毁灭自己,以便使简成为英国小说中的女性个人主义英雄”^{[4]250}。在该文中,斯皮瓦克批判了美国女性主义文学评论家忽视《简·爱》中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现实背景、忽视身为“本土女性”(native female)的伯莎的做法。斯皮瓦克精辟的后殖民解读树立了《简·爱》及《藻海无边》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时开辟了文学作品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①

《藻海无边》中克里奥尔身份以及吉恩·里斯作品中加勒比文化身份的探讨一直是里斯评论的重头戏。特罗尼达文学评论家肯尼斯·兰姆钱德(Kenneth Ramchand)在其颇具影响力的专著《西印度小说及其背景》(The West Indian Novel and Its Background, 1970)中探讨了吉恩·里斯作品中白种克里奥尔人的身份。历史学家兼评论家爱德华·布拉思韦特(Edward Kamau Brathwaite)认为,鉴于加勒比地区的种族史,无论安托瓦内特在她人生的最后时刻有着怎样的心理活动,她都不可能与蒂亚会合,“回归”只是幻想。90年代中期,布拉思韦特创作性地将里斯比做“我们这场(文化)战争的海伦”^{[5]69-81}。

20世纪90年代以来,涌现出众多围绕着里斯作品中加勒比文化身份^②的研究。探究吉恩·里斯

的文化身份对深入挖掘其作品内涵,探索里斯作品中的审美、政治、文化、心理、及伦理意义与价值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朱迪斯·雷斯金(Judith L. Raiskin)关于吉恩·里斯“白种克里奥尔意识”(“white Creole consciousness”)的探讨极富洞见,影响了之后里斯批评接受的研究导向,同时也为白种克里奥尔身份的后殖民理论研究提供了充分翔实的素材与依据。朱迪斯·雷斯金认为,吉恩·里斯的后期作品,如《藻海无边》、《老虎更好看》(Tigers are Better Looking)等均是在“解构殖民二元对立(如黑/白、英国/本土、文明/蒙昧、纯净/污染)方面所作的理论贡献”^{[6]107}。朱迪斯·雷斯金特别讨论了诸如里斯等殖民地宗主国成员复杂而含混的身份境遇。不同于后殖民斗士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 1925—1961)的“西印度黑人”视角,里斯是从白种克里奥尔人立场写作的。因此,她无法真正参与法农等后殖民思想家倡导的解放与抵抗话语。^{[6]107}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文评界多从《藻海无边》的后殖民话语和身份话语着手,或解读男女主人公的自我建构,或探讨作品中的身份意识与叙事策略间的关系,或挖掘该作中隐含的后殖民抵抗话语。

二、多声部叙事结构重构

克里奥尔疯女人伯莎

伴随着《藻海无边》中男女主人公多声部的叙述,记忆与历史之间,过往与此在之间的界限逐渐消逝。这种极具后现代主义特色的叙事策略一方面成就了里斯“异化的女性诗学”,另一方面也使《藻海无边》中的安托瓦内特成为后现代小说中的人物原型——一个名副其实的“幽灵”、一个幻影般的存在。此后的《简·爱》女性重写小说进一步发展了《藻海无边》中的多声部叙事策略,在后现代拼

① 此外,玛丽·洛·埃默里的专著《“世界尽头”的吉恩·里斯:殖民和性别流放小说》(Jean Rhys at “World’s End”: Novels of Colonial and Sexual Exile, 1990)细致入微地探讨了吉恩·里斯作品中的文化空间。Mary Lou Emery, Jean Rhys at “World’s End”: Novels of Colonial and Sexual Exil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0)。莫伊拉·弗格森(Moira Ferguson)将《藻海无边》与其他几位女性作家,如沃斯通克拉夫特与简·奥斯丁的作品进行了比较研究。Moira Ferguson, Colonialism and Gender Relations from Mary Wollstonecraft to Jamaica Kincaid: East Caribbean Connec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科拉尔·安·豪厄尔斯的专著《吉恩·里斯》(Jean Rhys, 1991)论述了吉恩·里斯作家身份中女性的、殖民的与现代主义的三重建构。伊莱恩·萨沃里的《吉恩·里斯》(Jean Rhys, 1998)则强调了加勒比文化对吉恩·里斯创作的影响。

② 在里斯研究者中,海伦·卡尔(Helen Carr)、朱迪斯·L·雷斯金(Judith L. Raiskin)、贝妮塔·帕里(Benita Parry)、特蕾莎·奥康纳(Teresa O’Connor)、迪斯·K·加德纳(Judith K. Gardiner)、科拉尔·安·豪厄尔斯(Coral Ann Howells)、玛丽·洛·埃默里(Mary Lou Emery)、韦罗妮卡·格雷格(Veronica Gregg)以及伊莱恩·萨沃里(Elaine Savory)等人纷纷聚焦吉恩·里斯的文化本源及里斯本人对刻写着种族、性别、阶级、位移及宗教印迹的身份的理解。

贴画般的叙事中消解着文本之外的真实世界与文本内虚构世界之间的界限。

《藻海无边》的叙事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女主人公安托瓦内特以自述的口吻讲述自己的童年及少女时代，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西印度群岛奴隶制解体后，英国殖民者的混血后裔——白种克里奥尔人——既受当地土著居民仇视，又受白人鄙视的夹缝生活，细腻刻画出她在那种境遇下的孤独、寂寞、饱受创伤的心理状态。第二部分采用了叙事声音转换的手法，大部分篇幅从罗切斯特（在书中为一无名叙述者）的叙事视角讲述，其中穿插了一节从安托瓦内特的视角进行的叙述。透过罗切斯特和安托瓦内特两种不同的叙述声音和心理视角，作者呈现了他们新婚蜜月以及感情逐渐破裂过程中的心理世界，以及安托瓦内特被逼酗酒，精神失常的痛苦过程。第三部分始于格雷丝·普尔的叙述，之后又回到安托瓦内特的心理视角，讲述她被莫名其妙地带到英国、囚禁在顶楼，受到疯子的待遇，最终被折磨得精神彻底崩溃、烧毁房子的过程。小说中约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从罗切斯特的视角叙述的，然而，作者并未给这个绝对意义上的男主人公命名^①。读者是通过《藻海无边》与《简·爱》文本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推测出该作的男主人公即《简·爱》中的爱德华·罗切斯特。

在《藻海无边》充满诗性语言与加勒比梦幻般叙事的文本中，母文本与子文本、历史与此在、作者与作品中人物的界限在历史与文本的羊皮纸书那一层层书写间渐次消失。斯皮瓦克在《三个女性文本与一个帝国主义批判》一文中指出，至少吉恩·里斯没有将伯莎刻画为疯狂的野兽以巩固宗主国白人女主人公简·爱的身份。从伯莎到安托瓦内特，从《简·爱》到《藻海无边》，吉恩·里斯不仅为隐匿在《简·爱》文本深处的克里奥尔疯女人命名，更匠心独具地运用多声部叙事结构重构了安托瓦内特的性别化种族身份。

里斯研究专家伊莱恩·萨沃里(Elaine Savory)试图挖掘吉恩·里斯的文化身份与其作品文本性之间的关系。她认为，里斯复杂的文化身份不仅反映在她作品的主题中，也反映在作品的文本性中，尤其在多声部的叙事策略中。^{[7]3}在《藻海无边》中，吉恩·里斯就是“运用殖民与后殖民反话语的写作策略，不断突出作为亚文本形式贯穿于文本主体的

内化的叙事缺省，叙述主体持续打断权威声音以重建已经支离破碎的主体身份。作为里斯反话语实践中最为叛逆性的文本，《藻海无边》反写了19世纪女性经典文本同时也是帝国主义文本中对这个白种克里奥尔女人的再现。”^{[8]24}

三、从安托瓦内特到疯女人伯莎

吉恩·里斯改写了《简·爱》中伯莎介于人兽之间的鬼魅形象，赋予这个克里奥尔他者人的生机与女性的特质和欲望。安托瓦内特也曾拥有美丽的容颜，就连罗切斯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从来没有领会到她有多么美。她的头发从脸上往后梳开，柔顺地披垂到腰下。我看得见她头发里闪着红光和金光”^{[9]53}。然而，安托瓦内特的美在罗切斯特宗主国白人男性目光下显得那么“异样”、“神秘”，犹如那片处于原始状态下的西印度群岛，“令人不安”的同时又让人心驰神往，渴望占有。^{[9]60}对罗切斯特而言，加勒比殖民地的天气“变幻无常”，这里的人“阴阳怪气”，就连自己的新婚妻子也是个“陌生人”。“那双眼睛太大了，会叫人发窘。看来好像从来不眨眼。眼睛长长的，黑黑的，深色忧伤，目光异样。她可能是纯英国血统的克里奥尔人，不过眼睛既不是英国型的，也不是欧洲型的。”^{[9]42}罗切斯特以绝对的欧洲中心标准丈量着这里的一切。

罗切斯特满足了安托瓦内特的女性欲望，给这个饱受创伤的克里奥尔姑娘生的希望，让她感受到久违的“幸福”。可在罗切斯特心中，他并不爱安托瓦内特。“我要娶的姑娘，对我毫无意义。……她同我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我并不爱她。”^{[9]50}大都会帝国知识体系与男权话语建构下的罗切斯特无法与安托瓦内特产生真正的认同。罗切斯特对安托瓦内特只有欲望的宣泄与身体的交融，而无心灵的交汇。“有时我(罗切斯特)总是轻轻摸摸她的脸，摸摸她的眼泪。眼泪——算不得什么。言语——更算不得什么。至于我给过她的那份幸福，那就压根儿不算什么。”^{[9]65}安托瓦内特仅仅是罗切斯特这个宗主国白人男性欲望投射的对象，她处在殖民话语与男性话语的双重奴役之下。罗切斯特让安托瓦内特欲仙欲死，然而一切“是按我(罗切斯特)的想法，不是按她的想法”^{[9]65}。罗切斯特与女仆阿梅莉之间的私情也如出一辙，并且，对于他们之间的逢场作戏，罗切斯特“根本没有悔恨过”，他

^① 在1966年2月20日写给戴安娜(Diana Athill)的信中，吉恩·里斯说：“我处心积虑地就是没有给他起名”。Jean Rhys, The Letters of Jean Rhys, eds. Francis Wyndham and Diana Melly (New York: Viking, 1984), p. 297.

“也不急于想知道同我们仅仅一板之隔的妻子的卧室里发生什么事”^{[9]107}。

然而,罗切斯特与阿梅莉之间的私情严重地伤害了深爱着丈夫的安托瓦内特,对她的精神造成重创。此事以后,安托瓦内特“头发蓬乱,毫无光泽,披散到眼睛里,眼睛红肿,直愣愣盯着,脸孔通红,看上去像浮肿”^{[9]112}。罗切斯特无情地玷污了安托瓦内特赖以维系身份的希望——生她养她的故土。她向罗切斯特哭诉道:“你知道你对我干了什么事吗?不是那姑娘的事,不是那姑娘。而是我本来热爱这地方,你却把这地方搞成我痛恨的地方。我过去总以为就算我生活中的其他一切都消失了,我总还有这个地方,如今也给你毁了。”^{[9]114}

在《藻海无边》中,吉恩·里斯细腻深刻地揭示出《简·爱》中的克里奥尔疯女人伯莎如何被逐步逼疯。一次次的认同障碍、加之罗切斯特对安托瓦内特身份的蓄意改造和割裂最终将这个原本富于生气的克里奥尔他者逼疯。《藻海无边》开篇就呈现出克里奥尔白人姑娘安托瓦内特遭遇的认同障碍。在纯种白人眼中,白种克里奥尔人根本不是白人,他们只是落魄的“白皮黑鬼”^{[9]38}。由于加勒比殖民地解放奴隶法案的颁布,昔日的奴隶主失去了原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像科斯韦家这样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家庭更是一贫如洗。

随着庄园经济的解体,在加勒比殖民地各种族之间开始上演新一轮的爱恨情仇、血雨腥风。正如加布丽埃·施瓦布教授(Gabriele Schwab)在《认同障碍:罪、羞耻和理想化》(“Identity Trouble: Guilt, Shame, and Idealization”)一文中所说:“一旦权力关系逆转,施暴者变成了受害者,受害者则成了施暴者。但这不是简单的逆转,因为曾经的施暴者带着罪恶和耻辱被卷入新一轮的暴力,昔日的受害者则满怀愤怒和仇恨。在另一个不同的权力格局中暴力再次粉墨登场,……。”^{[10]176}昔日处在奴隶主阶层的白种克里奥尔人如今的处境更是悲惨。黑人针对克里奥尔人的暴力事件频发,克里奥尔人的住宅也经常遭到黑人焚毁。

在黑人眼中,白种克里奥尔人是“白蟑螂”。正是这一蔑视性称呼以及黑人对克里奥尔人的仇视态度让安托瓦内特深刻认识到她与黑人之间的认

同障碍。这一认识在安托瓦内特与儿时玩伴蒂亚的认同失败中得到进一步证实。蒂亚是与安托瓦内特同龄的黑人小女孩,两人“曾经同吃,同睡,同在一条河里洗澡”,蒂亚“曾是我生活的一部分”^{[9]25}。然而,当黑人焚烧库利布里庄园,安托瓦内特全家人出逃的那晚,她看见蒂亚和她的母亲就站在路边。安托瓦内特朝蒂亚跑去,可是跑进一看,“她手里有块带尖棱的石头,可我没看见她扔。我也没感觉到,只觉得有什么湿漉漉的东西从脸上淌下。我瞧着她,只见她放声大哭时一张哭丧脸。我们互相瞪着,我脸上有血,她脸上有泪。就像看到了自己。如在镜中”^{[9]25}。在蒂亚这个种族他者身上,安托瓦内特曾一度看到自己的映像。通过与蒂亚认同,安托瓦内特逐渐确立自我意象。然而,这象征着认同的镜像^①关系却被蒂亚用石头无情击碎。

黑人与白人的疏离加深了安托瓦内特的认同障碍。在与罗切斯特结婚后,安托瓦内特又欲与之建立认同关系。然而,在罗切斯特眼中,安托瓦内特是个不折不扣的种族他者。“我渴望得到她,可那不是爱。我对她没几分温情,她在我心中是个陌生人,是个思想感情的方式跟我那套方式不同的陌生人。”^{[9]65-66}不仅如此,罗切斯特还将她的克里奥尔名字改为英国式名字——伯莎,从而塑造出安托瓦内特的另一个自我——被他者化的自我^{[4]250}。安托瓦内特自己也意识到罗切斯特“用别的名字叫我是想法把我变成另一个人”^{[9]114}。罗切斯特的这一举动分裂了安托瓦内特的自我,直接导致这个克里奥尔白人姑娘的精神分裂。加之后来他与阿梅莉的私情,严重伤害了深爱着丈夫的安托瓦内特,对她的精神造成重创,直至最终克里奥尔姑娘安托瓦内特被当成疯子幽禁在桑菲尔德府的阁楼中。

四、克里奥尔疯女人伯莎的身份实质

在罗切斯特与安托瓦内特这场男/女、主/奴的生死搏杀中,罗切斯特通过毁灭安托瓦内特这个种族他者的生命意志获得了一个宗主国白人男性殖民者完整的身份认同。吉恩·里斯通过重构伯莎的性别化种族身份,再现了那个曾经充满生机、曾经美丽的生命被剥夺家园、剥夺身份、被逼疯、被置于社会死亡状态,直至生命终结的悲惨经历。然而,这个种族意义上的他者与宗主国殖民主体之间在身份层面上究竟有无本质差异?

① 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婴儿在6—18个月左右开始区分身体与外界事物,即开始进入镜像阶段(mirror stage)。婴儿从镜中看到自己或他人的映像,这一发现使婴儿从之前与环境混同的身体认识过渡到将身体看成一个封闭的统一体。通过与镜中映像——“他者”——的认同,婴儿逐渐确立自我意象。拉康的“镜像说”为身份的确立提供了理论框架(虽然通过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构建自我意识的学说实际上起源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哲学)。

首先探究安托瓦内特与简的身份。美国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M.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革命性地将伯莎解读为“简最真实、最阴暗的对应物:她是简愤怒的另一面,是简从盖茨海德时代起就试图压抑的愤怒的神秘自我”。^{[11]360}此后的众多评论不断消解着简/伯莎这对好女人与坏女人二元对立体,更多地挖掘简这个理性的象征与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在心理上的共通之处。伊丽莎白·贝尔在论文“简·爱与安托瓦内特·科斯基之间的姐妹情谊”中追溯简与安托瓦内特之间的相通之处,认为吉恩·里斯将简与安托瓦内特呈现为“姐妹”。^{[2]131-48}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简是个孤儿,《藻海无边》中的安托瓦内特在父亲去世、母亲改嫁、房子被烧后也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孤儿。两人在童年和少女时代都经历了被排斥于阶级或种族边缘的疏离感;简在盖茨海德府红房子中被关的痛苦经历使她更容易理解幽禁于桑菲尔德府顶楼的伯莎;简在红房子的镜中看到的那个“异类”像极了渴望透过镜像关系确立自我身份而屡遭失败的安托瓦内特。

再深入安托瓦内特与罗切斯特的身份。实际上,罗切斯特所谓优越的种族身份,只是一种虚幻的建构,并无天然的合法性。来加勒比殖民地获取三万英镑的罗切斯特痛苦地发现并不是他占有了安托瓦内特这个种族他者,而是安托瓦内特买了他,是他为三万英镑“出卖了自己的灵魂”^{[9]44}。这一认识、这种颠倒了的主/奴关系导致罗切斯特最终通过打压安托瓦内特的身份、分裂安托瓦内特的自我来凸显自己作为宗主国白人男性殖民者身份的优越性与完整性。在罗切斯特与安托瓦内特这场男/女、主/奴的生死搏杀中,罗切斯特通过毁灭安托瓦内特这个种族他者的生命意志获得了一个宗主国白人男性殖民者完整的身份认同。

法农曾说:“殖民者创造历史,他的生活是一部史诗,是《奥德赛》;他,是绝对的开端。”^{[12]51}然而,《藻海无边》中的罗切斯特却未能在那片奇异陌生的西印度群岛上书写史诗。在加勒比殖民地那片欧洲白人男性殖民者书写欲望的空白场域,罗切斯特饱受生理、心理及文化的异化感,最终导致严重的认同障碍。当他带着疯妻和自己破碎的身份从西印度群岛回到英国时,他的“头发白了,眼神中很

痛苦”。^{[9]140}罗切斯特对安托瓦内特实施的心理暴力也使自己深受“同构式压迫”^①的伤害。禁锢着人性与良知的认知暴力摧毁的不止是宗主国男性殖民者/克里奥尔他者这对二元对立体中斜线右边处于劣势的群体,它同样销蚀、泯灭着斜线左边处于优势群体的意志和生命。所谓种族身份的优越性,只是一种虚幻的建构,并无天然的合法性。

五、结论

《藻海无边》是对存在于现实和文本中的殖民话语和父权话语的双重反抗。吉恩·里斯通过重构《简·爱》中克里奥尔疯女人伯莎的性别化种族身份,试图构建她本人(以及与她有着同样经历和命运的白种克里奥尔人)破碎的主体身份。里斯借助这种反话语实践让这个处于社会死亡状态的克里奥尔疯女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同时,也道出了自己作为一个流亡在帝国中心的克里奥尔作家亲身感受的认同障碍。吉恩·里斯对克里奥尔他者的重构,尤其是其后殖民重写实践质疑了欧洲中心叙事话语对加勒比以及克里奥尔身份的误现。她对伯莎性别化种族身份的重构同时也挑战了男权中心思想。正如科拉尔·安·豪威尔斯所说:“里斯的双重反抗标志着她对边缘性(outsiderliness)的认识维度,……她的文学复活通过这部小说得以实现,里斯在英国文学和加勒比文学传统中的地位也因此得以建立。”^{[8]24}《藻海无边》对其之后的《简·爱》重写作品乃至英语小说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此,伯莎这个克里奥尔女人不再疯狂。

[参 考 文 献]

- [1] Neville Braybrooke. The Return of Jean Rhys[J]. *Caribbean Quarterly*, vol. 16, no. 4 (December, 1970): 43-46.
- [2] Elizabeth Baer. The Sisterhood of Jane Eyre and Antoinette Cosway[M]// *The Voyage In: Fictions of Female Development*. eds. Elizabeth Abel et al. Hanover: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3: 131-48.
- [3] Helen Tiffin. Mirror and Mask: Colonial Motifs in the Novels of Jean Rhys[J]. *World Literature Written in English*, 17 (April, 1978): 328-41.

(下转第132页)

① 阿希兹·南迪(Ashis Nandy)将“同构式压迫”描述为压制关系中主人与奴隶、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施暴者与受害者共同体验着的异化和心理损害。白人殖民者对被殖民者实施殖民暴力。然而殖民暴力伤害的不仅是种族他者,殖民者自身也深受其害。这种深刻的辩证哲学洞见实际上回应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思想。参见施瓦布著:《文学、权力与主体》,第174页。

研究[J]. 计算机安全, 2010, (7): 1—4.

- [27] Zhang C, Bai J and Wahl T I.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traceable pork, milk, and cooking oil in Nanjing, China[J]. *Food Control*, 2012, 27(1): 21—28.
- [28] Ure? a F, Bernabéu R and Olmeda M. Women, men and organic food: differences in their attitudes and willingness to pay[J]. *A Spanish Case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 2008, 32(1): 18

—26.

- [29] Wu L H, Xu L L, Zhu D, et al. Factors affecting consumer willingness to pay for certified traceable food in Jiangsu Province of China[J]. *Cana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2, 60(3): 317—333.
- [30] 侯杰泰, 温忠麟, 成子娟. 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M].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责任编辑: 介九)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Certification Knowledge and the Evaluation on Consumer's Trust in Food Safety

YIN Shi-jiu, WANG Xiao-nan, GAO Yang, XU Ying-jun

(School of Economic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276826, China)

Abstract: Food safety certification syste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olicy tool to enhance food safety levels in various countries. 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of Jinan and other ci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the paper studied consumers' trust evaluation on the pollution-free food, green food and organic food, and made use of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certification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consumers' trust, and the influence of consumers' trust in their willingness to pay was verified, but the effect of awareness in food safety is not significant. Promoting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improving consumers' certification knowledge, can effectively elevate their trust.

Key words: Consumer Trust; Safety Food; Influential Factor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上接第 115 页)

- [4]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J]. *Critical Inquiry* 12. 1 (Autumn, 1985): 243—61.
- [5] Edward Kamau Brathwaite. A Post—Cautionary Tale of the Helen of Our Wars[J]. *Wasa firi*, 22 (Autumn, 1995): 69—81.
- [6] Judith L. Raiskin. *Snow on the Cane Fields: Women's Writings and Creole Subjectivity*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107.
- [7] Elaine Savory. *Jean Rhy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8: 3.
- [8] Coral Ann Howells. *Jean Rhys* [M]. New York and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 24.

- [9] 简·里斯. 藻海无边[M]. 陈良廷、刘文澜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
- [10] 加布里埃·施瓦布. 文学、权力与主体[M]. 陶家俊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76.
- [11] Sandra M. Gilbert and Susan Gubar.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Nineteenth — 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M]. New He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60.
- [12]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M]. Trans. Constance Farrington.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1963: 51.

(责任编辑: 程晓芝)